

网络问政初现端倪

——千篇征文描绘“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

□本报记者 张楠

“你好,我叫严东生。我要投稿,怎么给你们呢?”接到电话不久,“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活动办公室就收到了中科院老领导、两院院士严东生的手稿《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同行》。

“出于对中国科学院的热爱,我虽年逾九十,也要挤一些时间,写两篇回忆性文章。一是中国科学院的历史作用,因为现在很多人对此知之甚少。二是,我在沈阳30年,沈阳金属所的办所经验也许有一些参考价值。”两院院士吕昌绪在给征文活动办公室的亲笔信中写道。

吴征镒、丘成桐、唐有祺……这些知名学者,以及众多海内外公众,几个月来或怀念、或颂扬、或者建言献策,以自己诚挚的语言描绘着自己“心中的中国科学院”。

百天征集 千篇回音

“国家的科学院,人民的科学家——我

心中的中国科学院”网络征文活动自5月4日启动,到8月20日公开征集结束,利用网络这一便捷平台,先后共收到投稿1381篇,经审核后发布稿件1085篇。这些作品,不仅来自资深院士、知名学者、一线研究人员,还来自高校教师及在读的本科生甚至中学生。

征文活动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说,从内容分类看,建言类文章约40%,其余为颂扬类、回顾类和人物事迹类,体现了“建言未来发展、分析现实态势、再现优良传统”这一活动主线;从来源看,院外作者接近一半,其中海外作者撰文27篇,质量很高,体现了此次活动的开放性。其中,在院外作者中,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方锦清一人投稿达到16篇,几乎每篇都观点犀利、见解独特;在院内作者中,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原副所长陈子才一人投稿达26篇,记下了他多年来在科学院工作的真实感悟;在海外投稿者中,美国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郎尼·汤姆森作为“老外”,成了征文活动中的“花边”新闻。

为何有将近300篇征文稿件未能公开发布?征文活动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此解释说:“这主要是与一些投稿和征文活动的主旨以及征文要求不符有关。比如,未发布的相当一部分稿件内容和中国科学院的机构使命甚至是科技话题都没有关联,也有些纯粹是投稿者个人成果的展示。”

民主办院的新注释

黄石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大四学生陈翔的投稿作品《建议:建立科学的科研成果鉴定及其论文质量评价体系》的点击率与好评率都高居前列,文中不仅系统地列出了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他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为了这篇征文,他准备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才开始下笔,“或许会有不妥之处,但是愿和大家一起集思广益,为中科院更加完善的体制、更加美好的未来出一份力”。

在为数众多的征文投稿中,建言献策类文章是最受关注的一类。中科院有关领导

在中国科学院里,生活着一批特殊的科研工作者。他们金发碧眼,除说英文外,还说着一口有些生涩的中文;他们与中国科学家一道,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他们有的在中国住了几十年,有的只做短暂的停留,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成了中科院研究团队的一员和好朋友。

这些来华的外国科学家,都是通过中科院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和中国结缘的。2009年,中科院正式启动这项工程,计划在未来5年内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人才600名,并吸引和资助海外优秀学者和外国科学家1500名来中科院工作。

作为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中科院实施了“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等国际合作人才交流计划,连同新调整的“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一道,迅速发展成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30年,读懂中国农村

罗斯高是一名农业经济与农村政策学家,30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中国500多个县;作为一个“过来人”,他还知道不少人民公社的历史,对老北京的一些趣闻如数家珍。

一个老外跑来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罗斯高本人倒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我生在‘洛杉矶县’,我爷爷是养奶牛的。”

在中国,罗斯高名气不小。2008年,他不但成为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还接连获得首届“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009年,罗斯高凭借多年潜心研究取得的成果,当选中科院首届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

作为“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的外方负责人,罗斯高参与了对我国陕西、宁夏、青海等西部省份的大量实地调查工作,并协助中国申请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他曾先后为中国2000多个本科生和500多个研究生上过课,他的许多学生,现已成为我国主要农业经济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

在中国生活了30年,罗斯高亲眼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他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中国过去克服了许多困难,现在和以后的困难也都能够克服。我对中国感到非常乐观。”

“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邀请国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教授以上的高水平外国专家来中科院工作。截至今年5月,已有477位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获得国家著名国立研究机构、大学或企业。

据统计,这些学者每年在华平均工作时间为三到四个月,已然成为中国科研一线不可或缺的力量。

智力引进为中国科学添翼

中科院国际合作系列报道(之一)

美国小伙闯北京

Christopher Vavricka 来北京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宁静的小镇。他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读完了本科,又接着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似乎一切都是顺水推舟。

不过,Vavricka 对中国的向往,却一刻都没有停止过。2009年博士毕业后,他开始寻找来东方的机会。

2009年11月,Vavricka 来到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高福研究组,开始他的博士后研究。而资助他在中国科研和生活的经费,正来自中科院“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

“Chris很聪明,工作很认真,为人也非常有礼貌。”研究组成员这样评价这个美国小伙。而Vavricka 来中科院之后,科研上也如鱼得水,短短两年时间即有超过10篇高水平论文被接收和发表。

鉴于其优秀表现,Vavricka 在来中国的第二年,再次获得“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资助。“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Vavricka 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他很高兴在博士后研究结束后,能够谋到一份全职工作,继续留在中国。

像Vavricka 这样的外籍青年科学家,在中科院已有179位。这一计划主打“年轻牌”,专门资助40岁以下的外籍青年科学家和博士后来中科院进行合作研究,他们中有86%来自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

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和外籍青年科学家在受资助期间,与国内专家合作,参与多项科技部“973”、“863”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重大或重要方向性项目,承担多项研究所及其他单位重点项目,联合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许多论文。

2010年4月26日,国务委员刘延东会见中科院首批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和外籍青年科学家代表。她充分肯定了这两大计划在探索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结合新模式上发挥的作用,并希望它们能够成为具有示范意义和国际影响的科技合作与交流计划。

“爱讲”大师很爱讲

与“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和“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相比,“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的资格要老一些,科学圈里熟悉这个计划的,都喜欢称呼它为“爱讲”。

从2004年实施以来,“爱讲”就众星云集,能登上这个讲坛的,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某个研究领域声名显赫的大腕。

E言E语

科举制度把中国的精英几乎一网打尽,让中国的历史成了一部追逐权力的历史,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智力也基本上消耗于此。

留洋的或没有留洋的都应该一样唯才唯德是举,尽管我支持走全球公民道路,科学家可在全世界流动;但是,我更加欣赏和崇敬回国为国家科技发展努力的科学家。

留洋与否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是否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尽心尽力,对于有社会责任又有专业能力的科学家,应该得到充分的接纳录用与合适的职务安排。

对于拥有雄厚学术资本的人来说,在学术市场上价格就比较高,但是由于科技事业的特殊发展规律,学术资本拥有量最高的时候,往往也是一个人的创造力最低的时候,因此,按照经济学的原则来说,购买学术资本增量最大的人才是不划算的,因为相当于我们为他的过去成就重复支付金钱。以往人才政策的败笔也多出于此,由于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只能靠名气来衡量,不惜重金引进一个名气非常大的学者,但是,后来发现,其对科技的推动作用并不大,结果不了了之。

——详见科学网博客:李侠,http://blog.sciencenet.cn/u/老李

只有真正视办学为事业的教育家,才会尊重办学规律,尊重教育的内生逻辑。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在为高校配备领导干部时,除了政治导向、学术导向外,应该注重领导者的教育背景、从业经历、工作实绩,尽快实现教育家办学的目标。这是高校走内涵发展道路的保障,也是其内生的力量。

本科高校出现“零投档”,既是给这些高校敲起的警钟,也是给中国高等教育敲起的警钟。

——详见科学网博客:刘广明,http://blog.sciencenet.cn/u/lqmxl

科学时评

饶毅凭什么不能落选

□柯岩

近日,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公布,饶毅先生未能入选该名单。此事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从314位有效候选人,到145位初步候选人,淘汰比例从数字上可见一斑。甚至可以说,只要参选,就有可能落选,落选概率远远大于最终当选的概率。从某种意义上讲,谁也不能说饶毅先生就不能落选。

有人说,饶毅先生学术成就足够,所以不能落选。饶毅先生能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当然说明其学术成就不错。然而,学术评价是极为复杂的事情,水平高低的评定标准并不是绝对的。正如一位资深院士所说,选上的,基本都没问题;没选上的,未必水平就不高。

再进一步讲,即使这次评选过程中有些瑕疵,落选者也应该给院士增选制度以完善的时间。直接宣布退出,自己关上增选院士的大门,实在有些可惜。

事实上,院士增选制度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尽管已经被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世界上审查最严格、形式最民主的院士遴选制度,但正如其他所有制度一样,院士增选制度也有

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1992年,中科院学部主席团通过《院士增选细则》,在其后近20年里,该细则已历经九次修订。相信每次修订,都是为了院士增选制度能更公开、更透明、更合理。

也有人认为,饶毅先生对中国科技体制批评过多,导致其落选。这样的说法,是很难查证的。而且,中国科技体制有一定的问题,谁都没有否认过,各界的意见和批评也从来没有间断过,甚至一些院士也承认,中国的科技体制是需要改革的。因此,说饶毅先生因为批评科技体制而落选院士,很难让人信服。

笔者注意到,饶毅先生落选之后,公共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给予了过多关注,出现了一些常识不够甚至不负责任的猜测。这些猜测借助网络,以讹传讹,在一定程度上又误导了公众,引起新一轮过度关注。这样的情景,恐怕也是饶毅先生所不愿看到的。正如他8月22日在科学网博客所言,这引起了出乎他本人意料之外的关注,希望避免继续过度解读,应该将其中无意义的部分转化为较有意义的事情。理性审视因饶毅先生落选所导致的媒体解读现状,可以发现,中国科技的发展确实需要一个更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和舆论氛围。而这,恰恰是我们共同的愿景。



8月22日,“雪龙号”在上海船厂船坞内维修。目前,即将赴南极执行我国第28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号”极地考察船正在上海船厂进行为期40余天的船舶修理任务。此次船舶修理项目涉及甲板设备、通讯工程、动力机械、电气工程等相关的坞修工程,预计9月中旬各项修理工程结束并进行船舶试航。“雪龙号”预计将于10月底出发赴南极。

新华社供图

张峰/摄

军礼,他们的庄严承诺

——国防科大自主创新历程掠影(下)

□本报记者 张楠 通讯员 邹小军

从“哈军工”优良传统到“银河精神”,“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信念在国防科大代代传承。蝉鸣起伏的国防科大校园里,创新浪潮四处涌动。

校长杨学军认为,国防科大团队有几个特色:有内在文化;有共同的事业目标;有合理布局;有机制,科研资源能够在团队内部统筹、合理优化,新老交替也按计划推进。

让年轻人挑重担

人才队伍稳定是国防科大不断取得重大创新的有力保障,新老交替一直在稳步推进。

1994年,31岁的青年教员杨学军被任命为“银河-III”总设计师。而此前总师组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他的老师,他连课题组副组长都不是。

“银河-II”总指挥陈福接认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决定了‘银河-III’必须由年轻人来承担。因为‘银河-II’完成后,我们已经50岁了,再干完‘银河-III’就60多岁了,以后的机器怎么办?让年轻人挑重担,他们可以干好几代。”

“银河-III”的队伍成立时,平均年龄只有36.6岁。为保证完成“天河一号”研制任务,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由高性能计算等4个创新团队组成“联合舰队”,开展团队协作。为了啃下“硬骨头”,15名科研骨干进

行了长达4个月的封闭攻关,大家每天24小时换人不停地分析数据、调整代码、反复测算,终于把GPU计算效率从国际上一般能达到的20%提高到70%。

要对得起这身军装

为了对得起军人的称号,对得起身上的军装,“奉献”是他们永远的主题词。在这里,感人至深的事迹浩如繁星。

高性能计算创新团队的副教授袁贤福,已确诊为肝癌晚期,仍躺在病床上抓紧整理五大本教材。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被誉为“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的慈云桂泣不成声:“小袁,你走好,将来我见了马克思,还跟你们一起组队伍,搞银河机。”

2001年,中国第一辆磁悬浮列车整车上线,出现了车轨共振问题。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磁悬浮技术创新团队成员李杰天天坐在实验车内记录各种实验数据,终于解决了问题。现在,在李杰脑海中,与那两年有关的记忆只剩下厚厚的数据记录和车窗外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树叶。

2005年12月,时任银河麒麟操作系统主任设计师戴研究员,女儿刚出生就被送往了隔离监护室。他却接到了应用单位的求援电话,系统运行出现故障,急需技术人员帮助解决。他连夜奔赴外地,经过一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分析和调试,终于解决了问题。当他赶回医院时,女儿已经康复,正准备出院回家。他给女儿取名“安琪”,希望女儿平平安安、麒麟操作系统良好运行。如今,戴安琪已经快6岁了。

为了对祖国的承诺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国防科大先后有130多位教员、专家出国留学、进修或做访问学者。为了实践自己对祖国的承诺,他们全部如期回国,把理想和信念融入祖国的科技事业。

环形激光器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最初的激光实验室是由一间旧食堂改建的,环形激光器创新团队就在这个夏天像“火炉”、冬天像“冰窟”的“大闷罐”里开始了攻关。年近六旬的高伯龙,经常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在实验室里加班加点。

刚研制激光器时,毫无借鉴,高伯龙听说大理石的膨胀率较低,可以用作研制激光器的工作台。为节约开支,他推着平板车到长沙火车站施工场地拉大理石。即使碰上大雨,道路泥泞不堪,他依然风雨无阻。

1994年11月,我国第一个环形激光器样机通过国家鉴定。不久后的一天晚上,高伯龙难得轻松,走在校园宁静的路上,他突然发现不知何时多了一栋楼房。同行的丁高工哈哈笑道:“你才发现呀?这楼一年前就盖起来了。”高伯龙常年哮喘,因病情严重,必须到北京做手术。临行前,他还不忘嘱托:“我这一去不知会怎样,但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国家给我们投了那么多钱,一定要有个交代。”

战胜了病魔,高伯龙回到了实验室,如今虽已年逾八旬,仍不知疲倦地在科学高峰上跋涉。

原始创新不易,并需要长期、大量的身心投入,高伯龙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正因如此,创新更能为科技发展、为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做贡献,“否则那叫什么创新!”

“长期以来,学校自主创新团队的专家教授始终以‘强军兴国’为己任,献身使命,甘于奉献,顽强拼搏,团结协作,集智攻关,形成了‘领军人物+创新团队’的自主创新模式,从而创造出一大批标志性的科研成果,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国防科大政委王建伟这样总结。

快速响应空间系统与技术创新团队、信息物理与高能量密度物理创新团队、数据分析技术创新团队、精密工程创新团队、磁悬浮技术创新团队、自动驾驶技术创新团队、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创新团队、C4ISR技术创新团队、高性能计算创新团队、基础软件技术创新团队、网络技术创新团队、环形激光器技术创新团队……

他们,以血肉之躯,钢铁的意志,凭着对党的坚定信念、对祖国和人民的绝对忠诚,铸造着新时代的万里长城。

值班主任:张明伟

责任编辑:张赋兴

□总编室电话:010-82614597

□电子邮箱:news@times.cn

(下转 A2 版)

(下转 A2 版)